



明治维新时期财政研究

A Study on the Finance of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湛贵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明治维新时期财政研究

A Study on the Finance of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湛贵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治维新时期财政研究 / 湛贵成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1-28700-2

I. ①明… II. ①湛… III. ①明治维新(1868)—财政史—研究 IV. ①F81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2502 号

- 书 名 明治维新时期财政研究
MINGZHI WEIXIN QI CAIZHENG YANJIU
- 著作责任者 湛贵成 著
- 责任编辑 延城城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700-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0.75 印张 188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治维新时期财政研究”的最终成果。

日本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术界自然而然地会联系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时期正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旧的封建幕藩体制逐步瓦解,新的近代资本主义体制逐渐形成。这一过程开始于1853年佩里来航,结束于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在这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日本在政治上经历了封建的德川幕府统治的灭亡、新的近代资本主义政权确立这一新旧政权的更替过程,经历了中央集权取代封建的幕藩割据、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等历史发展阶段。日本在经济上因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国、开港,经历了商品货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个经济变革过程。这一时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是近代日本发展的奠基时期。因为正是明治维新才使得日本取得了成功,所以它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重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截至目前,很少有从财政视角进行探讨的。日本获得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必须注意到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非常大”^①。那么,财政政策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自身发生了哪些改变?又在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国内学术界恰恰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正因为如此,本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历史学、财政学的理论成果,利用历史与数量经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财政的演变及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与考察,揭示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政治、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国的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书大体上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的表现、成因以及幕藩统治者采取的应对措施。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德川幕府被迫适应商品经济发展,

^① [日]铃木武雄:《财政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2年版,第2页。

采取了年贡货币化、向流通领域征税、改铸货币从中获取改铸收益、征收御用金甚至发行金札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反而加速了封建财政基础的崩溃,最终导致德川幕府灭亡。

第二部分重点探讨新政府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采取的财政政策。新政府财源极不稳定,财政收支失衡,财政支出急迫且浩繁。为解决这些困难,由利公正借鉴自己在福井藩时期财政改革的成功经验,采取了动员豪商捐款、征收御用金、设立会计基金、举借外债、发行太政官札等措施。

第三部分着重考察了明治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实施的财政政策。明治政府在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后进行了财政机构改革,着手处理藩札、内外债务、秩禄等封建财政负担,清除封建残余,设立国立银行,改革地税,进行税制改革,编制并公开政府财政预算。

第四部分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明治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西南战争以后,明治政府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围绕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形成了以大隈重信、岩仓具视和松方正义为代表的三个派别,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明治政府认可了松方正义的观点,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整理纸币,整理国债,处理官营企业;设立日本银行,确立银行制度;建立近代公债制度;改革税制,对税收进行结构性调整,确立日本资本主义税制。明治政府致力于财政运营规范化、法制化,建立、健全财政、会计制度,最终实现财政向资本主义财政的转化。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与对策	1
第一节 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	1
一 幕藩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1
二 幕藩财政收支出现结构性变化	3
第二节 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	11
一 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幕藩财政基础的瓦解	11
二 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封建财政的崩溃	15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财政政策	19
一 德川幕府的财政方针	20
二 年贡货币化和向流通领域征税	21
三 改铸货币	22
四 御用金征收	25
五 发行金札	30
第二章 初创时期明治政府的财政政策	33
第一节 明治政府的财政困境	33
一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33
二 财源极不稳定	34
三 财政支出急迫且浩繁	35
第二节 成立财政机构与由利公正的财政观	37
一 设立财政机构	37
二 由利公正的财政观	38
三 由利公正出任财政负责人	45
第三节 征收御用金	46
一 金谷出纳所与经费筹措	46
二 设立会计基金	48

第四节	外债募集与废止银目	53
一	外债募集	53
二	银目废止	54
第五节	发行太政官札	56
一	建议的提出	56
二	发行的准备工作	59
三	太政官札的发行状况	61
四	太政官札流通遇阻	63
五	大隈重信的补救措施及成效	66
六	对太政官札的评价	68
第三章	加强中央集权时期的财政政策	70
第一节	废藩置县前后的政府财政	70
一	废藩置县前明治政府财政状况	70
二	奉还版籍与财政机构改革	71
三	废藩置县后的财政举措	74
第二节	处理封建财政负担	81
一	处理藩札	81
二	处理内外债务	86
三	处理秩禄	90
第三节	明治政府的财政革新	97
一	创立国立银行	97
二	改革地税	102
三	杂税改革	107
四	编制财政预算	111
第四章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的财政政策	117
第一节	西南战争前后明治政府的财政状况	117
一	明治政府的财政困境	117
二	财政困难原因分析	120
第二节	政府内部有关财政政策的争论	123
一	大隈重信的财政政策	123
二	岩仓具视和大木乔任的财政政策观	126
三	松方正义的财政观	128

第三节	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130
一	整理纸币与确立银行制	130
二	整理国债与公债制度的形成	136
三	处理官营示范企业	138
第四节	对税收进行结构性调整	141
一	制定地税条例	141
二	增征烟酒税	142
三	设立所得税	143
第五节	确立近代财政制度	144
一	改革财政制度	144
二	明治宪法的颁布与日本近代财政制度的确立	148
结语	明治维新与财政政策	150
一	财政政策从封建财政向近代资本主义财政的质变	150
二	财政政策与幕藩体制的瓦解	150
三	财政政策与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确立	151
四	明治维新时期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以及政治、 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151
主要参考文献	155

第一章 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与对策

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①明治维新时期期的财政也是如此。明治新政府在推翻旧幕府封建统治、逐渐确立自身在全国的统治的同时,也接手了贫困已极的财政,不得不直接面对旧幕府始终未能解决的财政危机,在缺乏财政专门人才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初期沿用旧幕府时期的许多财政政策。

第一节 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封建财政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佩里来航以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加剧了幕藩财政危机。到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已经接近崩溃。幕藩财政危机主要表现为:一、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收不抵支;二、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货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封建财政走向瓦解。

一 幕藩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大约占有全国土地的 1/4 左右,其余 3/4 的土地除天皇拥有不到 3 万石的领地外,归 260 多个大名领有。因德川幕府实行的是封建统治,德川幕府时期的财政主要以实物地租为主。这样一来,保持财政的经常性收支的稳定和收支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幕府中期开始,尤其是到了幕末,随着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财政规模的扩大,这种稳定和平衡被打破。

(一) 德川幕府的财政状况

1. 财政规模急剧扩大。首先,财政收入迅速增长。1832~1842 年间,德川幕府 10 年财政收入累计 400 余万两,年均 40 余万两;而仅 1843 年一年,德川幕府的财政收入就迅速增加到 589 万两,1863 年进一步增加到 691 万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603 页。

两。1843年一年的财政收入比1832~1842年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还多近190万两,是1832~1842年间财政收入年均额的14.7倍多,1863年又比1843年增加了100多万两,1863年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832~1842年间财政收入年均额的17倍多。1843年的经常性收入是1832~1842年年均额的4.1倍,1863年又比1843年多了350541两,是1832~1842年年均额的6.1倍,临时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比经常性收入还要大。德川幕府1843年一年的临时性财政收入比1832~1842年10年的临时性收入总额还多了近1.5倍,几乎与1832~1842年10年的财政总收入持平,相当于1832~1842年年均额的23.5倍多,1863年的临时性收入又比1843年多出677931两,1863年一年的临时性收入是1832~1842年年均额的26.6倍。其次,财政支出规模急剧扩大。相较于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比收入规模要大得多。仅1863年幕府的财政支出就膨胀到了700多万两。在财政支出方面,临时性支出远远高于经常性支出。1863年德川幕府临时性支出5737396两,经常性支出1319473两,临时性支出比经常性支出多了4417923两,是经常性支出额的4.3倍。^①德川幕府开国以来年度收支规模超出开国以前幕府年度收支规模的数十倍。财政规模的扩大,让作为封建财政支柱的收支部分变得无足轻重,德川幕府财政开始逐渐从带有浓厚幕府将军家计色彩的封建财政向近代财政转变。

2. 财政收不抵支。一般来说,经常性收支和年度总收支最能反映财政状况。总体上说,无论是年度总收支,还是经常性收支,德川幕府都已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

首先,在财政总收支方面,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财政上经常处于亏空状态。1847~1856年10年间财政收支有5年处于盈余状态,有5年处于亏空状态。但是,5个盈余年度累计盈余额725800两,5个亏空年度累计亏空额却高达1962700两,两者相抵,10年间累计亏空高达1236900两。其中,1847年德川幕府财政总收支亏空324000两,1853年亏空671600两,1855年亏空552200两。^②

最能反映财政状况的数据除了年度总收支外,还有经常性收支部分,该部

① [日]村上直、大野瑞男:《幕末幕府结算所史料》,《史学杂志》,第81编,第4号,第49页; [日]古岛敏雄:《近世经济史的基础过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355~356页,表1; [日]神木哲男、松浦昭编:《近代过渡期的经济发展》,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87年版,第250页表7-3; [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开港与维新》,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116~117页,表3-2。

② [日]新保博、斋藤修:《近代成长的胎动》,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167页,表3-18。

分相对而言是财政最稳定的部分,更能直接反映幕末财政的实际状况。1847~1856年10年间,与财政总收支盈亏变化相比,财政经常性收支只有2个年度盈余,其余8个年度全部处于亏空状态。2个盈余年度累计盈余额只有38500两,其中,1854年度仅盈余14300两,1856年度盈余也不过24200两。相比之下,8个年度累计亏空额662900两。10年间扣除盈余累计,累计亏空额高达624400两。^①其中,1847年经常性收支亏空195700两,1848年亏空97700两,1849年亏空80900两,1850年亏空91100两,1851年亏空12800两,1852年亏空126500两,1853年亏空162100两,1855年亏空98000两。^②

到了1863年,该状况进一步加剧,货币部分年度总收支和年度经常收支不但同样处于亏空状态,而且经常收支部分亏空数额进一步增大。该年年度总收支亏空额折合黄金为138936两,年度经常收支亏空额折合黄金为211699两。1863年经常性收支亏空额同1847~1856年年均亏空额相比,短短几年竟然增加了1.5倍多,高达129069两,比1847~1856年间亏空额的最高年份1847年还要高出15999两。这表明幕末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经常性支出的增长。

(二) 幕末地方藩国的财政状况

在德川幕府财政陷入危机的同时,各藩财政也陷入危机。其中部分藩的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德川幕府。明治新政府曾于1871年对藩债进行调查,根据新政府的调查结果,1868年日本有277个藩,藩债总额为6691万日元(两)^③,当时277个藩领地总收获量1881万石,1石时价折合3.56日元,贡米收入大约占总收获量的40%,即便按米价处于高位的1865年的米价(3.75两/石)计算,当年收入也只有2822万两,两者相比,藩债总额相当于该时期年度总收入的2.37倍。^④不难看出,无论是德川幕府还是藩国大名,其财政不仅出现了危机,而且已经处于崩溃状态。

二 幕藩财政收支出现结构性变化

随着幕藩财政规模的扩大,幕藩财政收支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货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① [日]新保博、斋藤修:《近代成长的胎动》,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167页,表3-18。

② 同上。

③ 《藩债辑录》,见[日]大内兵卫、土屋乔雄:《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9卷,改造社,1932年版,第138~139页。

④ [日]中村隆英:《明治大正时期的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2页。

（一）实物收支部分

以年贡米为代表的实物收支部分逐渐减少。在封建统治体制下,石高制成为幕府财政的基轴。^① 石高制,顾名思义,是一种根据领地收获量的多少收取贡租的制度,因以计量单位石来计算,故名。每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60公斤或180.5公升。由此看来,幕府财政实质上是实物财政,是封建财政。幕府财政收支主要以年贡米等实物为主,以货币为辅。但是,到德川幕府统治的后期特别是末期,幕府财政收入中以年贡米为代表的实物收入部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明显下降。1732年德川幕府的年贡米收入为906125石,1746年为892400石,减少了13725石,减少了约1.5%;1838年为691843石,比照1746年减少了200557石,减少了22.5%;1842年进一步减少到446362石,比照1838年又减少了245481石,减少了近35.5%。若将1842年的年贡米收入同1732年相比照,年贡米收入的减少额和减少比率更让人吃惊。两者相较,年贡米减少额为459763石,居然超过了1842年年贡米收入总额,减少率高达50.7%。^② 究其原因,是因为土地面积毕竟有限,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加上自然因素的影响,年成有丰歉之分。即便有的年份年收获量有所增长,人口规模的扩大又基本上将增长部分抵消掉了。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用货币缴纳的年贡数额明显增加,导致实物米部分逐渐减少。随着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它在幕府财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二）货币收支部分

货币收支部分在幕府财政收支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取代实物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从德川幕府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德川幕府财政收支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仅举德川幕府年贡收入为例,就可从中看出端倪。1729年德川幕府年贡中除年贡米外,收取银10502贯,1732年收取银9096贯,略有减少,但是1746年则增加到19858贯,1838年进一步增加到22451贯,而3年后的1841年,更是迅速跃升到663344贯。贯是日本的重量单位,每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5千克。照此折算,1729年,德川幕府年贡银787650两,这还没有加上年贡金。据统计,1729年,德川幕府年贡货币收取额折算金总额494940两,若按金一银五比价折算,共收取银2474700

^① 有关石高制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日〕松下志朗:《幕藩制国家与石高制》,塙书房,1984年版。

^② 《史学杂志》,第80编,第2号、第3号,第89编,第7号;《吹尘录·德川氏部一》,见《胜海舟全集》刊行会、〔日〕胜安芳:《胜海舟全集》,第9卷,讲谈社,1976年版;〔日〕松本彦次郎:《日本经济史料》,第10卷,三田学会,1913年版,第266页及后页;〔日〕古岛敏雄:《近世经济史的基础过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356页。

两。同一年,年贡米收取额为 710437 石,即使按 1868 年的高米价 3.56 两/每石计算,折合银 2560245.05 两,两者几乎持平。1746 年,货币收取额折合银 3759245 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 3176944 两,德川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年贡货币部分已经大大超过了实物部分。1838 年,货币收取额折合银 4082575 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 2462961.08 两,年贡货币部分已经是实物部分的近 1.66 倍。1844 年,货币收取额折合银 3504465 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 2157780.08 两,年贡货币部分已经是实物部分的 1.62 倍多。^①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年贡的货币部分和实物米部分尽管不同年份都有变化,有的年份甚至变化幅度相当大,但总体上,货币部分基本稳定并呈增加态势,实物部分基本上呈减少态势。19 世纪 4 个年份年贡收入的年均货币额为 635296.75 两,18 世纪 3 个年份年贡收入的年均货币额为 580472.67 两,19 世纪年均额比 18 世纪增加了 54824.35 两。相比之下,19 世纪 4 个年份年贡米年均石数为 464945.5 石,而 18 世纪 3 个年份年贡米的年均石数为 833320.7 石,同 18 世纪相比,19 世纪的年均石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368375.2 石,一增一减形成强烈反差。如果我们将这 7 年的货币收入额与实物米石数两组数字各自加以平均,会看得更加明显。货币部分 7 个年份一共收入 4282605 两,年均 611800.7 两,进入 18 世纪 40 年代以后,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均已超过年均数;而实物米部分 7 个年份一共收入 4982404 石,年均 711772 石,进入 19 世纪以后,除了少数年份略高于此数以外,均明显低于该平均数。

上述变化表明,至少在德川幕府的财政经常性收入中,货币已经取代实物米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这一变化更加明显。以 1863 年为例,该年幕府年贡米收入 576266 石,比 1844 年少了 29852 石,与 18 世纪 3 个年份的年均数 833320.7 石相比少了 257054.7 石,即使同前面述及的 7 个年份的年均数相比,也要低得多。与实物米相反,年贡收入中的货币部分,1863 年增加到 960844 两,比 1844 年多了 259907 两,同 18 世纪 3 个年份的年均货币收入额 580472.67 两相比,增加了 380371.33 两,即便与前面提到的 7 个年份的年均额相比,仍高出 349043.3 两。若将该年货币收入额按金一银五的比例、实物米按 3.56 两/每石折算之后再两相比较,就会发现 1863 年年贡货币收入额是同一年实物米收入的近 2.4 倍,这个比例不仅远远高于

^① 《史学杂志》,第 80 编,第 2 号、第 3 号,第 89 编,第 7 号;《吹尘录·德川氏部一》,见《胜海舟全集》刊行会、〔日〕胜安芳:《胜海舟全集》,第 9 卷,讲谈社,1976 年版;〔日〕松本彦次郎:《日本经济史料》,第 10 卷,三田学会,1913 年版,第 266 页及后页;〔日〕古岛敏雄:《近世经济史的基础过程》,岩波书店,1978 年版,第 356 页。

18世纪,也远远高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上论及的只是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的年贡收入部分,还没有提及财政收入中的其他部分。实际上,年贡收入只是幕府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在其他经常性和临时性货币收入方面。1844年,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额为4419510两,年贡部分只占其中的15.9%,非年贡货币收入相当于年贡部分的近5.3倍。1863年,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总额增加到了6917933两,年贡部分仅占其中的13.9%左右,扣除年贡部分之后,余额为5957089两。非年贡货币收入是年贡部分的6.9倍多。^①以上是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的大致状况,财政支出方面也是大同小异。

实际上,到了幕末,德川幕府连最基本的必需品——实物米都已经难以保证,不得不借助于货币收入部分来补充,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货币在德川幕府财政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当然,幕末财政收支方面的变化更主要的并不是实物米,变化最大也最剧烈、使整个幕府财政发生质变的还是货币收支,尤其是支出。

1844年,德川幕府财政支出中货币部分比1730年增加了3261940两,增加额是1730年支出总额的4.5倍;1863年比1844年增加了3063729两,增加额相当于1844年的76.7%,如果同1730年相比,增加额则高达6325699两,是1730年支出总额的8.65倍。相比较而言,1730年实物米支出592998石,1844年为655371石,1863年为659579石。1844年与1730年相比,时隔14年,仅增加62373石;1863年与1844年相比,时隔19年,只增加4208石。实物米支出方面虽然略有增长,但是涨幅不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若进行米价换算,1863年实物米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还不足1/4。^②

总之,幕末德川幕府财政随着规模的扩大,无论收入还是支出,实物米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货币已经取代实物米在财政中居于主导地位。

(三) 经常性收支与临时性收支

幕府财政收支中经常性收支比重越来越小,临时性收支所占份额越来越大。1832~1842年间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1827879两,临时性收入2183887

^① [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开港与维新》,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116~117页,表3-2中所引用的大口勇次郎统计的数据。

^② [日]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2版,第30页,表1-3,《幕府年贡米·货币等收支》;[日]阿部真琴、酒井一:《封建制的动摇》,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4,第10页;[日]中村隆英:《明治大正时期的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12页。

两,10年间临时性收入仅比经常性收入多356008两,临时性收入相当于经常性收入的1.2倍^①;1843年,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757233两,临时性收入5133103两,临时性收入已经是经常性收入的6.8倍;1844年,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796692两,临时性收入3622874两,该年临时性收入高出经常性收入2826182两,临时性收入是经常性收入的4.5倍;1863年,两者之间的差额进一步扩大,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1107774两,临时性收入5811034两,临时性收入比经常性收入多4703260两,是经常性收入的5.2倍。^②临时性收入的出现并增加肇因于临时性支出的出现和增长。1863年德川幕府的财政支出中,经常性支出1319473两,临时性支出却高达5737396两,临时性支出是经常性支出的4.3倍多,占幕府财政总支出的81.3%。临时性支出是幕府的计划外支出,这部分支出的出现和急剧膨胀掏空了幕府的国库,迫使幕府不得不为这一部分支出寻找临时的财源。让富商捐款、征收御用金甚至对货币进行改铸等措施是当时的统治者所能想到的、能在短时间内筹措到这么一大笔资金的有效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临时性支出剧增反映了幕府财政的困难程度,幕府近乎杀鸡取卵的措施不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加剧了本已相当严重的财政危机,进而引发和加深了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最终导致德川幕府走向灭亡。

(四) 新的收支项目

幕府财政收支增加了新的项目并且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传统收支项目所占比重降低。

18世纪上半期,年贡米、销售米金、各官署缴纳、上缴米金、工程费、贷款返还等构成德川幕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730年,年贡米收入509000两,为当年德川幕府最主要收入来源,在全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63.7%。此外,按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销售米金(14.1%)、各官署缴纳(6.9%)、上缴米金(3.6%)、工程费(3.4%)、贷款返还(2.6%)等。^③

19世纪40年代以后陆续增加了献金、御用金、货币改铸收益金、上缴帮工费、城堡修缮赞助金、河运杂税以及由幕府将军家的金库支出资金等收入

① [日]内田正弘:《明治日本国家财政研究——近代明治国家的本质与初期财政剖析》,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2年版,第190页,表1。

② [日]神木哲男、松浦昭编著:《近代过渡期的经济发展》,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87年版,第250页,表7-3。

③ [日]新保博、斋藤修:《近代成长的胎动》,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131页,表3-1、表3-2;[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开港与维新》,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115~117页,表3-1、表3-2(a)、表3-2(b);[日]古岛敏雄:《近世经济史的基础过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356页。

项目。其中,虽然 1844 年献金为 3470 两,仅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0.1%左右,1863 年则更少,只有 2977 两,在同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却成为幕藩统治者乃至后来的明治新政府初期筹措临时费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御用金只在 1844 年征收过一次,但征收额非常大,高达 518320 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20.1%,而且也在明治新政府初期被频繁采用。德川幕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还通过改铸货币即减少成色、降低质量以从中获取收益、增加财政收入。1842 年货币改铸收益金为 557323 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35.6%,1843 年为 394400 两,在当年所占比重为 25.6%,1844 年增加到 856400 两,比例为 33.3%,1863 年,收益金数额跃升到 3664399 两,在当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高达 68.7%。1842 年以后又开始让各藩上缴帮工费以增加财政收入,1842 年,上缴帮工费 91527 两,占该年财政收入的 5.9%,1843 年一度增加到 158000 两,占该年财政收入的 10.2%,1844 年和 1863 年的这一数字和比例分别为 3930 两、0.1%和 45994 两、0.8%。1844 年以后数额和所占比重虽均有下降,但仍是德川幕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财源之一。城堡修缮赞助金 1844 年收取 184150 两,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7.1%,1863 年减少为 51266 两,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0.9%。为增加财政收入,1844 年又开征河运杂税 5590 两,只占财政收入的 0.2%,1863 年有所减少,仅有 5381 两,在 1863 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值一提。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开征此税虽是德川幕府财政困难使然,但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业发达的一个反映。即便采用了上述多种手段和筹措途径仍解决不了资金短缺问题,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1863 年不得不从幕府将军家的金库中支出 300000 两以解燃眉之急,而且这笔资金居然占到该年财政总收入的 5.6%,成为 1863 年幕府第三大财源。^①

财政支出方面,18 世纪上半期,禄米、薪俸、官署经费、购米费用、修缮费、家计费、贷款等是德川幕府的主要支出项目。其中禄米薪俸一项,1730 年支出 297300 两,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 40.7%;1843 年支出数额虽然增加到了 405000 两,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却降到 28.0%。1844 年,支出数额进一步增加到 428300 两,所占比例反而进一步降到 20.1%。1863 年,用于禄米薪俸方面的支出几乎增加了一倍,数额高达 794970 两,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反而大幅度降低到 15.9%。官署经费 1730 年支出 149500 两,占当年

^① [日]新保博、斋藤修:《近代成长的胎动》,岩波书店,1989 年版,第 131 页,表 3-1、表 3-2;[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开港与维新》,岩波书店,1989 年版,第 115~117 页,表 3-1、表 3-2(a)、表 3-2(b);[日]古岛敏雄:《近世经济史的基础过程》,岩波书店,1978 年版,第 356 页。